

在中国二十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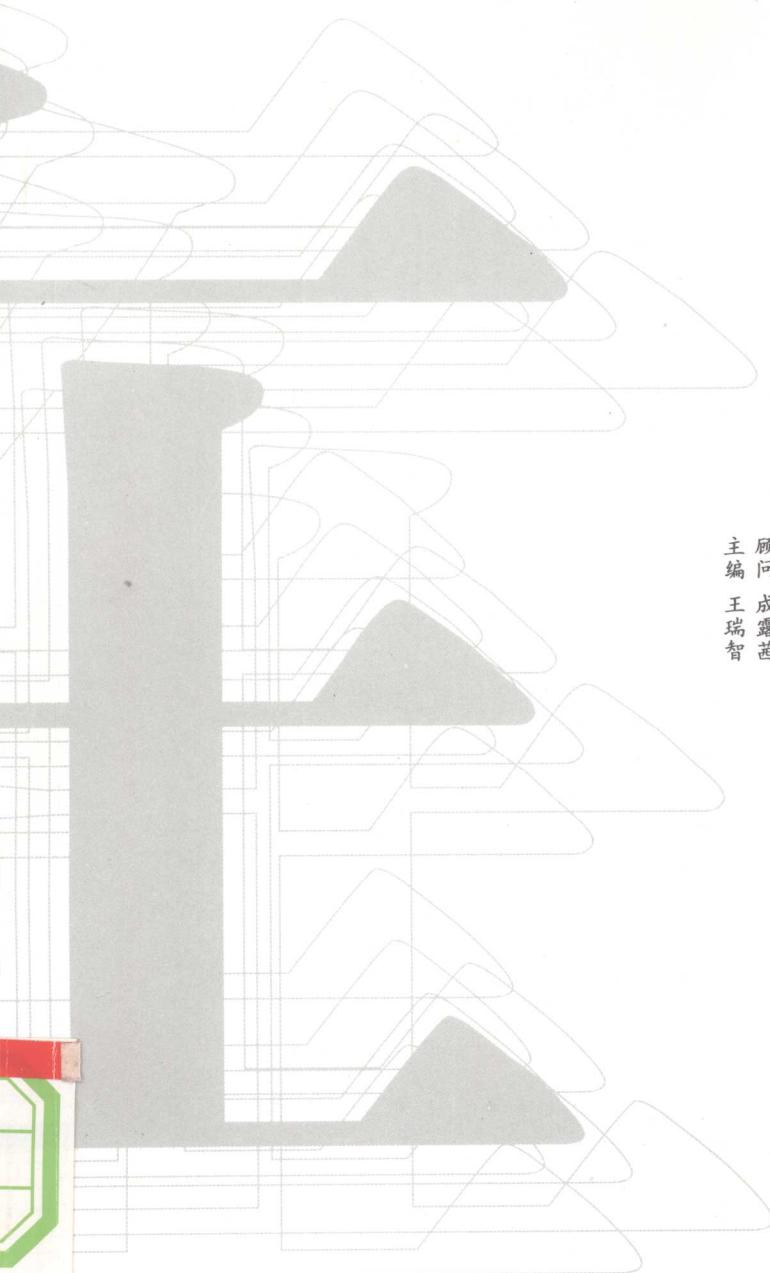
——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持人鲍惠尔回忆录

傳記文學

顾问 成露茜
主编 王瑞智

〔美〕约翰·本杰明·鲍惠尔著
尹雪曼 李宇晖 雷颐译

黄山书社



傳記文學

在中国二十五年

——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持人鲍惠尔回忆录

[美] 约翰·本杰明·鲍惠尔 著
尹雪曼 李宇晖 雷颐 译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中国二十五年/(美)约翰·本杰明·鲍惠尔著.
—合肥:黄山书社,2008.8
ISBN 978 - 7 - 80707 - 855 - 5
I . 在… II . 鲍… III . 鲍惠尔—回忆录 IV . K837. 125.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2190 号

书 名:在中国二十五年
——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持人鲍惠尔回忆录
著 者:约翰·本杰明·鲍惠尔
译 者:尹雪曼 李宇晖 雷 瞴
责任编辑:左克诚
特约编辑:张国功
装帧设计:翁 涌
出 版:黄山书社
社址 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发 行:广东联合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3.5
字 数:30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00 元

出版说明

《在中国二十五年》的作者是美国人约翰·本杰明·鲍惠尔。

1917年，鲍惠尔从美国来到中国，从事新闻工作，曾担任刚创刊的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该报是一份以介绍并评论远东和中国情况为主要内容的报纸。鲍氏支持中国抗战，于1941年12月被日军关进监狱，受迫害致残，1947年回美国。《在中国二十五年》是鲍氏在中国25年经历的回忆录。全书共分40章，主要内容有采访孙中山、张勋复辟、蓝辛石井事件、游说美国总统通过《中国贸易法案》、张作霖印象、采访日本侵占沈阳、访问苏联与菲律宾、西安事变、日本侵占上海等，所记之事多是作者所见所闻。其中涉及中国革命、国共关系、中日俄关系、日本侵华等重大焦点问题。特别是对日本侵略中国所犯罪行的揭露非常客观和真实，如南京大屠杀中两个日本军官对中国人民屠杀的比赛，日本侵占上海对市民的敲诈勒索，汪精卫伪政权投靠日本所干累累坏事等，都是一个新闻记者所见所闻的真实记录，对我们了解那段历史有一定的资料和参考价值。当前日

本右翼势力企图否定南京大屠杀，否定日本侵华的罪恶历史，《在中国二十五年》是对这些右翼势力的有力反驳。

该回忆录是一个外国记者在中国的传奇。他以外国人的眼光，观察中国，既有对上层政治的描述与思考，也有对底层民众生活的体验与感受。民国社会黑暗与动荡、自由与痛苦的真相得到了一种别具视角的体现。

《在中国二十五年》于1946年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20世纪60年代，尹雪曼先生将原书大部分章节译成中文，连载于台湾《传记文学》杂志。本社此次出版，除了采用尹雪曼先生的全部译稿外，李宇晖先生还翻译了《传记文学》未刊载的原书第四章、第三十七至第四十章，雷颐先生翻译了《传记文学》未刊载的原书第十二章、第十三章；这样使原书完整呈现给读者。同时，在基本保持全书原貌的基础上，我们也做了一定的编辑加工（详见“编后记”），以飨读者。

黄山书社

译者前记

我知道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大约是民国二十五、二十六年，那时，我正在河南省立安阳高级中学读书。由于喜欢阅读课外读物，所以才看到这本英文杂志。老实说，那时我的英文程度，并不足以使我阅读这本刊物。后来，对日抗战发生，我跑到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读书，由于交通不便，《密勒氏评论报》虽然还在上海出版，只是在西北大后方读书的青年学生，却很难看到。

一九六〇年春天，我忽然跑到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希望趁自己还不太老的时候，再去读点什么，学点什么。当时，在密大新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魏大公兄，以及好几位别的中国同学，都劝我不要读学位，因为他们认为密大新闻学院的课程太重，一个外国学生，很不容易克服大量阅读英文书刊和英文写作的困难。第一学期，我确有此感觉。可是，等我想起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力量，加上自己的全部所有，才跑到美国来，如果空手回去，实在有点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帮助我到美国去的许多长官和朋友以及内子金维萱，于是，我就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攻读硕

2 在中国二十五年

士学位。

这样，到了第三学期，我就面对着一个撰写毕业论文的问题。第一学期，一九六〇年四月，我为了学美国报业史，曾经写过一篇论文：《密勒氏评论报》，当时颇获院长英格里许博士（Dr. Earl English）和教授塔虎脱博士（Prof. William Taft）的赞赏。于是，有一天英格里许院长就对我说，他希望我的毕业论文，写《密勒氏评论报》。英格里许院长说：“《密勒氏评论报》是在上海创办和发行的美国报纸，又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两位毕业生——密勒（Thomas F. F. Millard）和鲍惠尔（John B. Powell）所主持，加以，鲍惠尔是最支持中国国民党和国民革命运动的美国报人，跟中国的关系最深，你应该把这份美国报做一个彻底的研究。何况，过去在密大新闻学院读书的中国学生，都没有做过这一份工作。”

我于是接受了这项指示。

接着，一九六一年夏天，正当中国学生纷纷跑往纽约打工赚学费的时候，我却一个人在学校里留下来，每天钻到密大校本部的大图书馆里，阅读在上海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那时，令我惊奇的第一件事，便是这份一九一七年在上海创刊的新闻性杂志，从创刊号起到一九五三年它被[……]停刊封闭止，一期不缺。我几乎费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才把它勉强看过一遍。我说勉强，第一是因为除非有关我的论文的文章，我一概不细加研究，只是把它们一页一页地看过就算。第二是因为除非我对那些文章特别有兴趣，我才读它一遍。譬如有几篇有关当年在上海颇为流行的洋泾浜英语（Pigeon English）研究，我就曾详细阅读过。第三是因为除非那些我不知道的事（《密勒氏评论报》创刊时，我还没有出生），而我觉得很有知道的必要，我才详加阅读。

这样，几乎有一百天，很多美国同学总是看见我一个人躲在那个固定的角落，埋头苦读和苦写。

除了每一期的《密勒氏评论报》外，我的论文材料另一个主要来源，便是鲍惠尔所写的一本自传式的书：《在中国二十五年》（*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这本书在密大新闻学院的图书馆里有一本，一九四六年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三十二开，四百二十三页，共四十章。由于它的内容丰富，而且所说的事都与我国有关，因此，我打算一字不漏地将它译出，以供国内人士参考。

鲍惠尔先生是一位热爱中国，对中国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革命运运动，对国父孙中山先生和“总统”蒋公最具赤诚和信仰的美国报人。由于在民初、北伐和对日抗战前，鲍惠尔的这种态度，以及他热诚地倡导中美合作，反对日本军阀侵略中国，因此，民国三十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上海公共租界，首先就把鲍惠尔关到日本军牢里。在日本军牢里，鲍惠尔吃了不少苦头，日本军阀把他的膝盖打伤，致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后的一九四七年，死在纽约。“总统”蒋公暨夫人曾电鲍惠尔夫人吊唁。

鲍惠尔虽然是这样的一位正派报人，但他的儿子小鲍惠尔（John William Powell）却很不争气。对日抗战胜利后，鲍惠尔因为身体未告复原，不能回到中国，小鲍惠尔就一个人跑到上海，打着父亲的旗号，恢复了《密勒氏评论报》。但是，小鲍惠尔是个左倾幼稚病患者，民国三十四年复刊后的《密勒氏评论报》，在言论态度上，就有不少受共产党影响的地方。但是，小鲍惠尔以为他那样做一定可以获得共产党的赏识，因此，到了一九四九年，他仍在上海继续出版《密勒氏评论报》。只是，

4 在中国二十五年

[……] 从周刊改成半月刊，再改成月刊，从十六开本，缩小为三十二开本，最后仍然逃不掉关门的命运。一九五三年《密勒氏评论报》被 [……] 停刊后，小鲍惠尔的迷梦也告一段落，于是他不得不夹起尾巴，狼狈地逃回美国。

一九六二年秋天，当我撰写我的论文时，有些问题，在我手边的资料中是无法找到答案的。我的顾问教授武道（Maurice Votaw）就要我写一封信给鲍惠尔太太。但是鲍惠尔太太回信说，她也不知道，要我写信问她的儿子。但是，我不肯跟小鲍惠尔通信，并把这种情形告诉武道教授，武道教授极为同意。武道教授也是密大新闻学院毕业，在中国工作几近三十年，并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院院长，对中国情况极为熟悉。后来，到了一九六二年初，我的毕业论文以优异成绩获得通过。二月间，举行口试时，有一位教授就指出我论文中的一项缺漏，问我为何有这样的疏忽。当时，我就告诉他那不是我的疏忽和缺漏，是因为不屑于跟一位左倾幼稚病患者通信。接着，武道教授也替我说明我的立场，并表示那是经他同意过的疏漏，我的口试才算过关。当时，我真的出了一身汗。

一九六三年回国后，由于忙着写别的文章，一直没想到鲍惠尔的这本书：《在中国二十五年》。今年初，由于政工干校新闻系毕业的学生徐唤民到密大新闻学院去读书，我就托她代我买一本。可是，她来信说她跑了很多地方，写了很多信去搜购，书店里的人都说已经绝了版。不得已，她花了二十二元美金替我影印了一本，又花了五元七角美金给我航寄了来。收到后，我十分高兴，立刻写封信去谢她。其先，我跟传记文学社刘绍唐兄谈起这本书，绍唐兄听了很感兴趣，因此，才促使我积极设法把它找到。我想，鲍惠尔的这本书不仅可以提供我们许多我国民初和抗

战前的一般史料，而且是一本很好的有关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史，
可供我国新闻学系的学生参考。同时，由于这本书的内容写得轻
松有趣，也是很好的一本普通读物。但因我的所知有限，错译的
地方，恐怕在所不免，因此，尚希朋友们指教。

目 录

| | |
|--------------------------|-------|
| 译者前记 | (1) |
| 第一章 到东方去 | (1) |
| 第二章 如此上海 | (7) |
| 第三章 国际城市 | (19) |
| 第四章 孙逸仙和袁世凯 | (30) |
| 第五章 内战的阴影 | (37) |
| 第六章 蓝辛石井事件 | (43) |
| 第七章 上海的白俄 | (51) |
| 第八章 游说哈定总统 | (61) |
| 第九章 山东与华府 | (69) |
| 第十章 华北之战 | (74) |
| 第十一章 “蓝钢皮”事件 | (82) |
| 第十二章 华南事态 | (116) |
| 第十三章 二十年代的党争 | (123) |
| 第十四章 上海之战 | (131) |
| 第十五章 干涉的外交把戏 | (144) |
| 第十六章 中俄之战 | (154) |
| 第十七章 二次世界大战“真正”的肇始 | (166) |

| | | |
|-------|-----------------------|-------|
| 第十八章 | 俄国、中国与日本 | (177) |
| 第十九章 | 海参崴之旅 | (186) |
| 第二十章 | 横越西伯利亚 | (199) |
| 第二十一章 | 一九三五年的莫斯科 | (212) |
| 第二十二章 | 经日本达上海 | (225) |
| 第二十三章 | 一九三六年的菲律宾 | (234) |
| 第二十四章 | 西安事变 | (243) |
| 第二十五章 | 翻然醒悟 | (253) |
| 第二十六章 | 西安事变的结果 | (260) |
| 第二十七章 | 日趋紧张的局势 | (275) |
| 第二十八章 | 一九三七年的美国军舰和日本炸弹 | (288) |
| 第二十九章 | 我与《论坛报》 | (305) |
| 第三十章 | 愈来愈重的压迫 | (311) |
| 第三十一章 | 炸弹与刺刀 | (321) |
| 第三十二章 | 德国人的阴影 | (331) |
| 第三十三章 | 历史断线了 | (345) |
| 第三十四章 | 日本人的无能 | (356) |
| 第三十五章 | 恐怖的大桥监狱 | (362) |
| 第三十六章 | “危险思想” | (376) |
| 第三十七章 | 美国谷物在中国 | (386) |
| 第三十八章 | 上了交换名单 | (393) |
| 第三十九章 | 回家的旅程 | (399) |
| 第四十章 | 中国的未来 | (411) |
| 编后记 | | (417) |

第一章 到东方去

一九一七年二月初，我搭乘一艘小小的货船到达上海，船慢慢地在虹口区的一个码头停靠后，我于是提着衣箱上岸；后面跟着一名脚夫，肩上背着我那双老式的洋铁皮衣箱。那天正在下雨，沿着黄浦江两排长列的仓库、栈房中间的街道，十分泥泞和狭窄。这时，两辆黄包车从后面追踪而来。虽然，那样的车足可容纳我个人和我的行李；但是，我仍旧决定步行到我预订的旅馆——理查饭店。这次东来，途经日本，我也曾见过黄包车，而且还在横滨坐过。可是，对于东方的一切，这时我仍旧觉得十分生疏。坐在那种由人类拖着跑的黄包车上，我浑身会觉得不舒服。

我这次到东方来，命运注定了要在这地球上政治情况最动乱的一个地方，办二十五年的报。这是由于米苏里大学的一位校友密勒（Thomas Franklin Fairfax Millard）的一封电报所引起。密勒在远东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新闻记者。

密勒的电报是从上海打给米大新闻学院院长威廉（Dean Walter Williams）的。电报上说，他希望邀聘一位米大的毕业生，帮他在上海创办一份报。威廉院长于是把这封电报给了我，而那

2 在中国二十五年

是我生平所见的第一封横越大洋的电报。

在这个期间，我正在为了两个其他的工作机会左右为难。这两个工作机会，一个是爱渥华州首府第蒙（Des Moines）的一家经济性日报的发行人的邀约；另一个是来自乔治亚州大西洋城的一家日报，这家报纸的发行人，希望我去做他的助理。但是，到东方去这个意见，却又富有很大的诱惑。因此，在我跟我的太太和同事们几次三番地研商后，我还是决定结束一下我在米大的工作，前往中国。

我不像辛克莱（Upton Sinclair）小说中的那位英雄，“降生在国际社会和外交阴谋的王国中”。我出生在米苏里州西北的一个田庄上，在一个乡间小学校里就读，后来又在这所乡间小学里教课，赚了一些钱，才到伊利诺州的昆西城，一边念高中和商学院，一边为一家早报和一家晚报送报。这样过了几年，我又转入那家老资格的《昆西自由报》（Quincy Whig）去做实习记者，赚几个钱，用做我到米大念书的学费。在米大，我读的是新成立的新闻学院。四年毕业后，我又回到米苏里州的西北区，在汉尼堡（Hannibal）的《邮递报》（Courier-Post）工作。汉尼堡是美国已故名作家马克·吐温幼年的故乡，我在那儿为《邮递报》做了四年的广告部经理兼发行部监督、市政组的编采主任，然后才回米大新闻学院做讲师。

就像那个时候，很多州里的其他美国年轻人一样。我对于远在天边的中国和日本的全部了解，只是从地理和历史教科书上很少几页的文字中和并不正确的地图上获得。即令是在米大读书的时候，我记得也只有一两次的历史课堂上，教授们在提到古代、中古和近代史的时候，才说到中国。但就是这些，教授对中国所说的也不是什么恭维话。

但是，我认识不少在米大新闻学院就读的中国和日本留学生。这些留学生的一个，名叫黄辛，是一位出生在广东，后来从火奴鲁鲁来米大就读的中国的留学生。他跟我合作筹办一个“四海俱乐部”，会员准备包括各国的在米大就读的学生。组织这样一个俱乐部的动机，当时是基于我在学校报纸上所写的一篇文章，谈到米大的外国留学生的问题。另外一个在我教的那一班上课的中国学生，是来自上海的董显光。董和黄后来都成为中国新闻界的知名人士，只是他们两人的政治立场不同。另外一个从东方来的学生，是一位日本人，名叫户田（Toda），长得十分矮小，但却是我那一群学生中和学生军团中最好的学兵。那时，我不知道他在来美国读书前，已在日本陆军部队中服役过三年。

我到上海去办报这件事，终于惹起米大同事们很多的好奇和羡慕。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我到上海去协助创办的，是什么样的张报，因此，无法使我的心情得到平静。同时，我又成为许许多多希奇古怪而幽默的问题的箭靶。譬如有一个朋友问我能不能阅读“鸡脚印”？说着，并把一张当地中国洗衣店里开出的收据拿给我看，要我解释给他听。而米大理发店的理发师也问我不要赶快留起辫子来，他说他可以帮忙。

但是，当一天天接近我启程到中国去的时间，我也一天天地增多对未来工作的了解。我曾经有一次写过一篇小城市报纸组织计划大纲，在一家经济性的报纸上发表，结果，被许多小城市的报社采用。这个计划对我的新工作会不会有帮助呢？将来在上海出版的这份报纸，是什么性质？我要不要写社论？拉广告和订户？或者就像一个典型的乡下报社一样，什么事我都得插一脚？对于这样一把抓的报社，我是太熟悉了。因为我曾经在小城镇的报社干过，除了排字没做过外，真是无所不为。可是，我只是不

4 在中国二十五年

知道中国人有没有印刷工会。另外，我不知道中国报社有没有铸造排字楼，能够铸排五千个中国字。别人告诉我，这是一份中国报普通用的字数。

由于感觉有助于对我要去的地方增加了解，于是我跑到米大图书馆，找到两本有关中国的书。一本是：《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另一本是：《中国乡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这两本书的作者，是曾经在中国传教五十多年的牧师史密斯博士（Dr. Arthur H. Smith）。史密斯博士向以言谈幽默风趣知名；在这两本书中，他对于中国和中国人，也有不少极幽默的描写。因此，在美国各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并不喜欢史密斯博士的这两本书，他们觉得他对中国人的生活有偏见。有一次，在我刚到上海后不久，我去听史密斯博士讲演，他讲的是当时北京的政治情况。那时，北京的共和政府刚刚经过一阵宣统复辟的骚乱。史密斯博士在这一次的演讲后，就打道回美国退休了。但是，当时在场听史密斯博士演讲的听众，特别是刚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当他们听史密斯博士的结论说“中国现在正站在悬崖边缘”，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沉重。但是，这种沉重的感情立刻又被史密斯博士的话跟表情冲淡。当他幽默地眨眨眼，想了一想后又说：“事实上，自从五十年前我到中国，这个国家始终站在悬崖的边缘。”

一九一七年元月，我在旧金山搭乘日本远洋客轮“日本丸”，向中国进发。在那个时候，我认为美国不会参加历时业已三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当我搭乘的这艘日本轮船到达日本的长崎，这个与欧洲人接触最早的城市，也是我们在日本停留的最后一个港站，我同别的旅客结伴上岸游览，观光这个古老的日本城市的商店时，忽然，一位船员奉船长的指示跑了来，对我

们说，凡是去上海的旅客，要立刻回船把自己的行李取下。据这位船员说，这是因为船长奉到设在横滨的东洋汽船会社总公司的指示，在长崎把所有去上海的旅客丢下，然后，直放马尼拉。于是，另外两三位和我同船的旅客，虽然我们买的都是去上海的船票，但这时却突然发现我们已经被遗弃在这个小小的奇异的日本港口——长崎。

接着，我们就到长崎的轮船公司去打听，看有没有别的船开上海。结果，据那些轮船公司的职员说：在三个星期内，没有任何船只往上海。这时，由于我身上所剩的钱已经不多，因此，我就到港口去打听，看能不能跟任何一艘去上海的货船同走。结果，经过我在码头上跑来跑去，跑了半天，总算找到了一位船长，他愿意给我一个舱位，把我带到上海。但条件是除了我把那张没有用完的横渡太平洋的船票给他外，另外再给他十元美金，而且，在船上我还得吃自己的饭。在无可奈何下，我同意了，并且立刻把我的行李弄来，匆匆忙忙地买了些吃的东西，以便跟这条船横渡中国海，因为，它在几个小时后就要启锚。只是，这条货船的船长只能说一点英语，而且，对我这位美国乘客并不感多大兴趣。

天气寒冷而阴沉，但当船离开九州西方的海湾时，太阳从云端里出来，天气于是变得暖和。这个时候，我开始嗅到船上有一种极难闻的怪味，而且，随着天气的变暖，这种怪味简直呛人欲呕。不得已，我跑去找船长，问他这是什么怪味道。船长立刻指着一大堆稻草包着的货物，堆在甲板上和大开舱门的舱口，说：“臭鱼——只有中国人才吃的臭鱼。”此后，经过好几个星期，这种怪味才从我的衣服上消失。可是，对于这种怪味，经过若干年以后，我才把它忘掉。

说起来，我能搭上这条船真是幸运极了，因为另外一艘在俄